

---

---

# 18 世纪初至 19 世纪中叶 泉州商人的北艚蔗糖贸易\*

林 仪

---

---

〔摘 要〕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于康熙年间设立海关开海贸易，沿海贸易迅速兴起，海道成为新的南北商品贸易大通道。福建商人特别是泉州郊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大力展开闽台地区和江南、山东、天津和关东的远距离北艚商品贸易，将闽台地区盛产的大宗商品蔗糖、果品、木材、杂货等源源不断地输向江南、华北和关东大地，同时又将江南的大宗商品棉花、布匹、丝绸，华北的杂粮，关东的大豆、豆饼等商品运回，促进了南北间商品的交流。在泉州商人北艚贸易的货品中，蔗糖是其中最重要的商品。

〔关键词〕泉州商人 北艚 蔗糖贸易

**Abstract:** After the reunification of Taiwan, customs were established for overseas trade during Kangxi's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Due to rapid development of trade along the coasts, the sea route became a new channel for trade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Fujian merchants, especially those from Quanzhou, played important roles. They dealt in the long-distant trade between the Fujian-Taiwan region and Jiangnan (Southern Yangtze River region), Shandong, Tianjin and Guandong; this network of trade was called Bei-cao (boats sailing to the northern coast of China) trade. They sent to Jiangnan and North China commodities like cane sugar, fruits, wood and groceries from Fujian and Taiwan, and they brought back commodities like cotton, cloth

---

\* 本文为 2014 年 8 月“人海相依：中国人的海洋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

and silk from Jiangnan , grains from North China , as well as soybeans and bean - paste biscuits from Guandong. Cane sugar was the most important good in the Bei - cao trade.

**Keywords:** Quanzhou merchants; Bei - cao trade; Cane sugar trade

清代前期，随着清政府解除海禁，实施开海贸易政策，福建与沿海各省间的经贸往来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当时，海上商业交流成为清代地区间物资调剂余缺的重要途径。

## 一、清初泉州商人沿海北艚贸易概况

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迫使福建商人选择了向北部沿海发展的道路。当时，江浙沪的棉纺织、丝织业等均较发达，福建则是亚热带经济作物和水果大量出产的地区。福建需要江浙沪的产品，江浙沪地区也需要福建商人采购来的产品，双方通过海上商业交流达到了各自的目的。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统一台湾后，清政府宣布开海贸易，并于次年相继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昔日对沿海贸易的种种禁限大都自行废止，福建商人从此即可自由通行于沿海各埠。海运贸易中，北方的豆货、果品南下，闽台地区的糖货、洋货、木材北上，江南地区的棉布、棉花输出，以及内地茶、纸、瓷器等商品的南北转销，是最主要的贸易内容。当是时，福建商人活跃于沿海各地，“上而关东，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皆闽广商船贸易之地，来往岁以为常”。<sup>（1）</sup>

清代的福建商船统称为福船，分称有四种，即：横洋船、糖船、南艚和北艚。“自厦门贩货往来内洋及南北通商者，有横洋船、贩艚船。横洋船者，由厦门对渡台湾鹿耳门，涉黑水洋。黑水南北流甚险，船则东西横渡，故谓之‘横洋’。船身梁头二丈以上，往来贸易，配运台谷以充内地兵精，台防同知稽查运配厦门，厦防同知稽查收仓转运。横洋船亦有自台湾载糖至天津贸易者，其船较大，谓之糖船，统谓之透北船。以其违例，加倍配谷。贩艚船，又分南艚、北艚：南艚者，贩货至漳州、南澳、广东各处贸易之船；北艚者，至温州、宁波、上海、天津、登莱、锦州贸易之船。船身略小，梁头一丈八、九尺至二丈余不等；不配台谷，统谓之贩艚船。”<sup>（2）</sup>北艚的海船“或载糖、靛、鱼翅至上海。小艇拨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桌绵、凉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至浙江则载綾罗、绵绸、绉纱、湖帕、绒线；宁波则载棉花、草席；至山东贩卖粗细碗碟、杉枋、糖、纸、胡椒、苏木，回日则载白蜡、紫草、药材、茧绸、麦、豆、盐、肉、红枣、核桃、柿饼；关东贩卖乌茶、黄茶、绸缎、布匹、碗、纸、糖、面、胡椒、苏木，

（1）（清）蓝鼎元《漕粮兼资海运疏》，载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48，《户政二三》，中华书局，1992年，第1153页。

（2）（清）周凯《厦门志》卷5，《商船》，载《台湾文献丛刊（影印本）》第39册，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

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参、银鱼、蛭乾。海壩弹丸，商旅辐辏，器物流通，实有资于内地。”<sup>〔1〕</sup>

福建特别是沿海的泉州、漳州、福州、兴化等府，人多田少，出海贸易一直以来都是广大民众的谋生手段。开海通商合法化后，沿海各省出海贸易形成热潮。自宋元以来，造船操舟一直是泉州沿海居民谋生的优势行业。清代前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海运通道的畅通，泉州商人凭借着善于造船操舟的这一传统行业优势和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地理优势，不仅大力开展闽台地区对江南、山东、天津和关东的远距离北艚贸易，将闽台地区盛产的大宗商品蔗糖、果品、杂货、木材、茶叶等，源源不断地输向江南、华北和关东大地，同时又将江南的大宗商品棉花、布匹、丝绸，华北的杂粮，关东的大豆、豆饼等商品运回，在沟通南北商品流通和保障民众生活、增加国家财政税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就以康熙末年到咸丰后期的几则事例，来了解清初泉州商人沿海北艚贸易概况。

1、康熙五十六年六月十五日，泉州府晋江县发字壹千壹百叁拾陆号船户陈顺兴，水手19人，驾双桅洋船一只，装载客货粗碗15 000个、白糖500篓、糖果24桶、冰糖30桶、竹笋26把、鱼翅大小5捆、乌糖4篓，水手带碗10 000个，进入天津港。同时又有同县发字壹千伍百贰拾捌号船户蔡兴利，水手19人，客商侯世英、黄朝瑞2人，装载客货白糖550篓、冰糖20桶、糖果4桶、粗碗10 000个、粗小碗5 000个、鱼鳔1捆，进入天津港。<sup>〔2〕</sup>

2、雍正元年六月，晋江船一只，装运碗、布、胡椒、苏木等，前往锦州，装运瓜子。

3、乾隆五年五月十二日，泉州府同安县船户王同兴等21人，驾船一只，装载糖货由厦门出发，前往宁波府发卖。随到山东收买柿饼、核桃、紫草、粉干、青豆等物，于十一月初五日放洋回闽，遇风漂至琉球国麻姑山地方。

4、乾隆六年，泉州陈得丰驾船一只前往上海，抵达后因无货可载，前往锦州，锦州又无回货，适有货客徐必等雇往盖州，就在盖州揽载高士等人之货，顺途回船，遭风漂到琉球。<sup>〔3〕</sup>

5、乾隆十四年，泉州府同安县船户林仕兴等35人，四月十八日驾双桅船一只，载糖从厦门开船，前往天津贸易。九月初九日出口，往锦州装载黄豆、瓜子等物。十月十一日到石岛，十六日放洋，陡遇大风，漂流海上。

6、乾隆十四年，泉州府同安县商人陈得昌等20人，驾同安县顺字二百七十六号牌照商船一只，八月二十日船到锦州。十月十六日在锦州装货出口到山东石岛，十一月十四日放洋，十八日遭风，二十一日飘到琉球姑米山。船上客商赵瑞林，绍兴府诸暨县人，在关

〔1〕（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2，《赤嵌笔谈·商贩》，载《台湾文献丛刊（影印本）》第21册，第48页。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7辑，“直隶总督赵弘燮奏报闽船到津并载货情形摺”，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初一日，中华书局，1985年，第1048-1049页。

〔3〕《历代宝案》第2集第24卷，台湾大学刊行，1972年，第2352-2353页。

东贩瓜子货物，搭陈得昌船要到苏州。

7、乾隆十四年，泉州府晋江县船户王源利等 26 人，在山东胶州装载青、白、绿豆和核桃、柿饼等物，要往浙江乍浦，行至大洋遭风，十二月十四日漂到琉球大岛地方。<sup>(1)</sup>

8、乾隆十四年，泉州府同安县商人李顺等 24 人，驾船一只，往天津贸易，转至山东，买绿豆、核桃等物。当时有搭客 7 人，又有漳州府龙溪县商船二只在山东莱州府被水打破，连同水手共计 13 名附搭本船，三船共 37 人。十一月十五日，彼地放洋，遭风，漂到琉球国由论岛。<sup>(2)</sup>

9、乾隆十六年，泉州府同安县船户林顺泰，于五月内装载苏木等货，自厦门出口前往奉天贸易，买货回厦。十月内在洋遭风，漂至琉球。<sup>(3)</sup>

10、乾隆二十五年，泉州府同安县 24 人，三月十四日装载沙糖、武夷茶、粗碗等货物，自同安开船，往山东买卖。在山东装运赤豆 500 石，棉花 100 包，木耳 75 包，苡仁 50 包，茧绸 200 匹，十月十四日回向本乡。十月二十一日遭遇大风，漂到朝鲜罗州。<sup>(4)</sup>

11、乾隆二十五年，泉州府同安县陈天相驾商船一只，通船舵梢 26 人，五月间在广东装载货物出港，到天津发卖。又买红枣，于十月初二日，由天津驾回广东。十七日在洋遭风失事。

12、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泉州府南安县人伍叠与陈林春合置小商船一只，在厦门置买糖货，赴浙江宁波发卖，后在宁波买豆 390 石回闽。<sup>(5)</sup>

13、嘉庆六年，泉州府同安县商人徐三贯等 23 人，四月初四日在本县起程，二十日到广东地方，收买赤糖、白糖等项，欲往天津发卖。有商客 8 人附乘该船。六月初十日开船，八月二十日到天津府发卖糖货。又买收红枣、乌枣、核桃、梨子等物，要回家贸易。十月十六日由天津开船，十一月十一日在山东外洋遭风。

14、嘉庆六年六月，泉州府同安县商船装运杂货前往天津，又在盖州装了豆、棉花、茧紬、鱼菜、皮物要回泉州，途中遇风漂流。

15、嘉庆十八年，泉州府同安县人和漳州府海澄县人 36 人，同安县客商 12 人共 48 人，四月初七日自同安县往台湾府装载糖货，五月十五日往上海县交易茶叶。七月初六日，又自上海县往锦州交易。后贩载黄豆 1 000 石、白米 12 包、鹿肉饼 8 包、牛筋 5 包、木耳 7 包、远志 10 包、甘草 15 包、丹参 5 包、赤芍药 7 包、瓜子 30 包、柴胡 4 包、防风 6 包，要回本县。十月二十七日发船，后遇风漂流。<sup>(6)</sup>

(1) 《历代宝案》第 2 集第 31 卷，第 2589 页。

(2) 《历代宝案》第 2 集第 31 卷，第 2588 - 2589 页。

(3) 《宫中档乾隆朝奏则》第 3 辑，“福建巡抚陈弘谋奏”，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刊行，1982 年 12 月。

(4) [日] 松浦章编著、卞凤奎编译 《清代帆船东亚航运史料汇编》，台北乐学书局，2007 年，第 47 - 55 页。

(5) 《宫中档乾隆朝奏则》第 50 辑，“福建巡抚杨魁奏”，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6) [日] 松浦章编著、卞凤奎编译 《清代帆船东亚航运史料汇编》，第 131 - 135 页。

16、嘉庆十八年，泉州府同安县人22人，五月二十八日往台湾装载糖货，八月十四日到天津卸下。又自天津贸载黑枣100石、红枣1800石、干葡萄25包、酸干6箱、小鱼干6包、白米烧酒20缸，要回福建。十一月初三日猝遇大风，漂到朝鲜全罗道灵山郡。<sup>(1)</sup>

17、嘉庆十八年，泉州府同安县、南安县、晋江县和漳州府龙溪县、海澄县人水手50人、客商23人，共73人，坐船主黄宗礼船，于六月间装载砂糖、胡椒、苏木前往天津贸易。十一月初一日装了红枣欲回福建，初三日到锦州地方，忽遭狂风，漂到朝鲜全罗道灵光郡。<sup>(2)</sup>

18、嘉庆二十四年，泉州府同安县吴永泰等30人，雇了漳州府海澄县船只，往西锦州，收买了豆子和杂货（豆子800包，货物是瓜子、牛筋、甘草、杏仁共十五六包），九月二十二日上船，二十五日行到山东地方，次日遭遇大风，漂到朝鲜全罗道罗州慈恩岛。<sup>(3)</sup>

19、道光四年，泉州府同安县船户洪振利等通船舵梢29人，搭商客9人，共计38人，四月十五日在本县出口，五月初一日到台湾装载粮米。六月十七日该地开船，八月十九日到天津，交付明白。九月十九日在该地空船开驾，十月十六日转到盛京奉天府锦州置买豆货。二十九日该地放洋，要回本籍。十一月十二日洋中遇风。

20、道光四年，泉州府同安县商民32人，坐驾盛字三百三十八号商船，五月二十五日在本县空船出口，二十六日到台湾装载大米。六月二十七日该地开船，八月二十五日到天津贸易。十月初三日装载乌枣该地开船，二十八日转至山东，收买豆饼。十一月初四日该地开船，要回本籍。十二日在洋遭风。

21、道光四年，泉州府同安县32人、漳州府龙溪县4人，坐漳州府海澄县船主石希玉船，装载糖货，七月初一日往盖平县发卖，交易各种豆子（黄豆520包、青豆530包、饭豆50包）、黑菜、粉条、牛筋、牛油、鱼脯、粮食、烧酒等物。十月初四日要回海澄县，初十日遭遇大风，漂到朝鲜全罗道罗州海岛。<sup>(4)</sup>

22、道光十年闰四月，福建商船在台湾装糖前往天津，又在关东装运黄豆、绿豆、瓜子、防风等回泉州。

23、道光二十三年，泉州府同安县船主侷桥等3人，八月十五日本地开船，十六日到台湾府收买风炉等项，要到他方发卖。四月二十日该地开驾，驶到半洋，遭遇飓风。

24、咸丰四年，福宁府霞浦县霞字十八号商船主张万兴等25人（系福宁府福安县、兴化府莆田县、泉州府同安县等处人），七月间，奉海防分府府照，领装京米11石，准予随带货物一件，运赴天津。其米到局交卸完竣，货物也就地贸易。至九月间，由天津府

(1) [日] 松浦章编著、卞凤奎编译 《清代帆船东亚航运史料汇编》，第126-129页。

(2) [日] 松浦章编著、卞凤奎编译 《清代帆船东亚航运史料汇编》，第136-140页。

(3) [日] 松浦章编著、卞凤奎编译 《清代帆船东亚航运史料汇编》，第141-144页。

(4) [日] 松浦章编著、卞凤奎编译 《清代帆船东亚航运史料汇编》，第146-149页。

出口，到山东贸易。至十二月初一日，该地开船，要回本籍，初五日遇风。

25、咸丰十一年，泉州府晋江县商船船主蔡改等 51 人，装载碗料、木料、白糖等货，七月十二日在本县祥芝港出口，二十六日到天津发卖。至十月十六日装载豆饼、白豆、粉干、毡帽、茧绸、熟地、烧酒、水烟、乌枣等货，该处开船，要回福建省，二十八日遇风。<sup>(1)</sup>

从上述自康熙五十六年至咸丰十一年 25 起事例中，我们可以明确获知泉州商人北艚贸易的航向目的地大致是四个地区：一是天津；二是以锦州为中心的关东；三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四是山东。其中前往天津贸易的事例最多，可能缘于海运的日益兴盛，而河运的日益衰落，京师的官民消费品通过天津入口供应的数量日多。同时，这四个航向也并非贯穿全程的，也不以一个地点为目的，而是根据采购商品的需要，或应商客的要求，或者通过逐段接力的形式，或者随时改变航向，完成贸易活动。如第 3 例，泉州船从厦门出发，前往宁波府发卖后，随后到山东收买商品。第 4 例，泉州船前往上海，因无货可载，继续前往锦州，锦州又无回货，又开往盖州，在盖州揽货。第 5 例，泉州船从厦门开船，前往天津贸易，从天津出口后，又往锦州装载商品。第 6 例，泉州船前往锦州，后到山东石岛贸易。第 7 例，泉州船在山东胶州装货，要运到浙江乍浦贩卖。第 14 例，泉州船前往天津卖货，又在盖州装货。第 15 例，泉州船在台湾装载糖货，往上海县交易茶叶，后往锦州交易。第 17 例，泉州船装载砂糖等物前往天津贸易，后到锦州地方。第 19 例，泉州船在台湾装载粮米，开往天津，后来到锦州置买豆货。<sup>(2)</sup>

## 二、泉州沿海北艚贸易的主导

清代泉州商人相当活跃，特别是泉州的郊商，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对经济的繁荣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郊商，就是经营郊行的商人。“郊”，即在某一地区经营或专营各种商品的同业公会，分为内、外郊，内郊对内贸易，外郊对外贸易。“行”，即商行，指经营大批货物的批发商。郊行分为两大类：一类以经营同类商品商人的同业公会，如糖郊、布郊、米郊、碗郊等；一类是贸易同一地区商人的行会，如鹿郊、淡郊、笨郊、宁郊、申郊、厦郊等。<sup>(3)</sup> 郊商们主要从事搜集本地土特产品运到外地销售，到外地采购本地所需货物。经营的形式主要是批发，有的采取直接贸易，有的采取转口贸易。郊商们通过行郊来了解商品属性、议定价格、分配市场、协调关系，成为清代福建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商帮。

(1) 《历代宝案》第 3 集第 6 卷，第 8519—8522 页。

(2) 以上事例第 2、3、5、11、13、14、19、20、22、23、24 来自于松浦章《清代帆船沿海航运史の研究》，参见范金民《清代前期福建商人的沿海北艚贸易》，载《闽台文化研究》，2013 年第 2 期。

(3) 李玉昆、李秀梅《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年，第 196 页。

泉州当时对省北港口贸易的郊行，有宁波郊、梧栖郊（台湾）、厦门郊、申郊等等，尤以宁波郊最大，资金雄厚，长袖善舞，可以垄断泉州商业市场，操纵物价。宁波郊商自造大帆船——乌艚，共有40余艘行驶于泉州与宁波之间。以宁波为转口，范围扩大到上海、杭州、温州、青岛、烟台、天津、大连、牛庄、营口等地。因此，宁波郊又分为大、小北郊，均经营南北土特产品。穿行泉州至宁波为小北郊，穿行青岛、烟台、天津、大连、牛庄、营口之各埠间为大北郊。泉州宁波郊商经营的主要商品是蔗糖。

在现今浙江宁波的庆安会馆中，保存着一个清代的石铭砵。这个石铭砵是在宁波东渡路与江夏街一带宁波天后宫（又名灵慈宫）即福建会馆旧址上发掘出来的。该馆在1950年因国民党飞机轰炸宁波东西交通主干道灵桥时被炸，成为一片废墟。1982年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宁波市文管办联合组织的考古队进行发掘时在大殿中出土的。<sup>〔1〕</sup>铭砵上镌刻着“□□砵码 叁佰叁拾觔 温陵糖帮 冰糖公砵 同治甲子建置”铭文。



砵中所写的“温陵糖帮”即为清代泉州郊行组织中的一个。在泉州晋江市安海龙山寺前，有光绪五年（1879）立的《龙山寺重兴碑》（此碑文内容见下文），碑高264厘米，宽94厘米。此碑由晋江知县叶小兰撰文，记载龙山寺于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五年一次大规模重修。从捐资名录中可看出捐资郊商行号遍及台湾、福州、漳州、厦门、泉州、晋江、南安、安海、深沪、东石等地达46家以及温陵糖帮、洋药帮，安海台郊、安平干果郊、台郡泉郊、台郡笨郊等6家郊行组织。其中就有关于“温陵糖帮公捐银壹百元”的记载，全文如下：

### 龙山寺重兴碑记

龙山寺者，安平千手眼观音佛祖古刹也。佛之灵感异常，笔难尽述，而寺则东汉时高僧一粒沙所创建。隋皇泰间重兴，而后历代修葺不能尽记。迨明天启年间，御史苏君同思敬堂颜、住持僧玄默募捐重修。国朝康熙丁酉年靖海侯施君赐

〔1〕 林士民 《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307页。

进士出身在仪风颜君、僧浮生募修。乾隆戊申年，孝廉时普颜君、贡生紫霞颜君、僧普杨募修。道光辛卯年，前晋江县朱公、举人叙适颜君、僧然信募修。阅今四十余载，风雨飘摇，瓦砾不无渗漏。于是住持僧方彻爱请檀樾主思敬堂颜泊安平诸董事，议廓旧规。殿堂门庑，钟鼓楼亭，一尽卸平，重新起盖，易木柱以石柱，拆土墙为砖墙。山门之外，左右壁堵皆用青石雕成。而于殿之后，重建大雄宝殿，崇奉三世尊佛。两旁翼堂互对，环列为中堂屏障。东旧有罗汉堂，肖厅祀名宦禄位。兹又于西再建一堂，与东相配。前厅为节孝祠，规模宏耸。望之则树木成荫，栋宇凌云。施以丹□，蔚为宝刹之巨观，虽大禅林不是过也。是役始于同治癸酉年正月廿六日，告竣于光绪己卯年，计费白金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余员，钱八百九十余千文。以兹庙貌聿新，增巍峨之气象；山川灵秀，美轮奂之光辉。况是宝象庄严，晨钟暮鼓，永奠神恩，广大法雨，慈云齐施，民物安阜，遐迩均沾矣。是为记。

钦加同知衔署晋江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叶小兰捐廉首倡并撰文。

光绪五年岁次己卯仲秋之月吉旦诸绅士勒石。

安海林瑞佑、(瑞) 岗捐银捌百六十员，吕宋众信士捐银贰千七百员，檀越主颜君仕倡修捐银四百元，芙蓉乡杨合春号捐银三百员，东石乡蔡树滋捐银贰百员，福省南舍馆公捐银贰百元，总董洪步阶捐银壹百员又青石门球壹对，沪江陈兴泰号捐银壹百五十员，安海许德兴捐银壹百壹十六元，营前洪合胜号捐银壹百员，安海吴香兰捐银壹百大员，沪江詹孔怀捐银壹百员，东石蔡怀春号捐银壹百员，北轩僧了醒捐银壹百元，安平干果郊公捐银壹百元，温陵糖帮公捐银壹百元，安海台郊公捐银壹百元，沪江尤开淮捐银七十元，衙口施瑞成号捐银六十元，漳郡张如嵩捐银五十元，曾棣黄光余捐银五十元，安海桂崇礼捐银五十元，东石蔡树基捐银五十大员，曾埭黄光造捐银五十大员，东石蔡协和号捐银五十大员，沪江吴协芳号捐银五十大员，东石杨和发号捐银五十大员，沪江陈宝合号捐银五十大员，泉郡接官亭捐银四十大员，沪江陈东昌号捐银四十员，厦门许泗漳捐银四十员，沪江陈嘉兴号捐银四十员，温陵洋药帮公捐银四十员，台郡泉郊公捐银三十六员，沪江吴协庆号捐银三十五员，南邑蔡清良捐银三十五大员，台郡笨郊公捐银三十贰大员，沪江陈益源号捐银三十壹员，泉郡浮桥庵公捐银三十大员，沪江吴协昌号捐银三十大员，晋邑林协茂号捐银三十大员，沪江翁吉记号捐银三十大员，梅岭张天台敬捐银三十大员，沪江同丰号敬捐银三十大员，沪江陈义胜号捐银三十大员，杉行安向荣公捐壹佰元，福建金永兴钱八十千，福省蔡顺发五十员，湖格乡吴菩良五十员，南邑溪东李太和捐青石山底，安海□顺令捐银三十大员，福省金和、连顺号合六十元，福建陈春源号四十元，黄恒丰号三十元，四方人等助小工者不计其数。



住持僧方彻幕缘重建<sup>(1)</sup>

从石铭砵上所记的时间“同治甲子(1864)”与《龙山寺重兴碑记》上的时间光绪五年(1879)来看,这两处的“温陵糖帮”应该为同一个郊行,主要经营的是泉州与宁波之间的糖业贸易,即宁波郊中的小北郊。而泉州的天后宫,则是清代宁波郊的商业活动场所,不仅在天后宫正殿存有苏福宁郊捐修的石柱,在宫内原本还存有三个清代苏福宁郊的糖砵(现已展陈在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分别是两个清嘉庆七年(1802)泉郡苏宁福郊的青糖砵,铭砵上镌刻着“嘉庆壬戌年公订 泉郡苏宁福青糖砵”铭文。以及一件清嘉庆七年泉郡苏宁福郊的白尾糖砵,铭砵上镌刻着“嘉庆壬戌年拾月置 泉郡苏宁福糖行公订白尾糖砵”铭文。这三个糖砵与宁波天后宫出土的温陵糖帮公砵一样,说明泉州天后宫为宁波郊的商业活动场所,宁波郊经营的主要商品是糖。



白尾糖砵



青糖砵



青糖砵

## 三、泉州北艚蔗糖贸易概况

泉州地区背山面海,四季如春,土特产品特别丰富,如蔗糖、桂圆、陶瓷、泉缎、茶叶等,均畅销国内外。但是泉州人稠地少,粮食和棉花供给不足,大部分靠外地供应,因此具备了互通有无的条件。正如褚华《木棉谱》所言“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sup>(2)</sup>在这种条件下,泉州的北

(1) 吴金鹏《清代蚶鹿对渡史迹调查》,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

(2) (清)褚华《木棉谱》,载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1469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页。

糖贸易就兴盛起来，“糖去棉花返”的民谚，正说明这种贸易关系。

甘蔗是福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制糖历史悠久。早在闽越王时代，就有石蜜的制造。据《西京杂记》载“南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白鹇、黑鹇各一双。高帝大悦，厚报遣其使。”<sup>(1)</sup> 据考证，石蜜是一种蔗糖与牛乳混合制品，坚硬如石，故称石蜜。至 10、11 世纪，福建成了甘蔗生产的中心之一。北宋初，全国四大甘蔗产地，福建的泉州、福州占了两处。<sup>(2)</sup> 北宋嘉祐六年（1061），泉州府同安县人苏颂编的《图经本草》对甘蔗这样记述“今江、浙、闽、广、蜀州所生，大者亦高数丈。叶有两种，一种似荻，节疏而细短，谓之荻蔗；一种似竹，粗长，榨其汁以为砂糖，皆用竹蔗，泉、福、吉、广多作之”。“蔗有两种，赤色名昆仑蔗，白色名荻蔗，出福州以上皮节红而淡，出泉漳者皮节绿而甘。其于小而长者名管蔗，又名蓬蔗，居民研汁煮糖泛海鬻吴越间。”<sup>(3)</sup> 宋元时期，晋江两岸甘蔗的大量种植，为制糖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明嘉靖《惠安县志》记载“宋时王孙、走马埭及斗门诸村皆种蔗煮糖，商贩辐凑，官置监收其税。”并记载白砂糖的制法“凡煮糖取蔗入碓舂烂，用桶实之。……则浆液自窍注大桶，酌入釜烹炼。俟其浆渐稠，挹置大方盘中冷结，遂成黑砂糖。至正月复取黑砂糖煮之，劈鸭卵投釜中疾搅之，使渣滓上浮、辄去、至尽。……至三月霉雨候用赤泥封之，大约半月一易封，伏月剖封出糖。则糖水沥尽，其凝定者遂燥结无湿气是谓。白砂糖，其响糖、糖霜皆煮白砂糖为之。”<sup>(4)</sup> 其他各县之产糖亦不亚于惠安。元代南安人黄长者还发明了黄泥盖糖脱色法，提高了糖的质量。<sup>(5)</sup> 在《诸蕃志》中记载，当时泉州的糖曾运销占城、真腊、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东部一带）、单马令（今马来亚境内）等国。

明清时期，泉州的甘蔗种植更加普遍。《泉州府志》“物产·果之属”记载“甘蔗，丛生似芦，多节盈握，竿高六、七尺，赤色，名昆仑蔗，白色名荻蔗。”“所谓荻蔗，用以煮糖，泉地沙园，强半皆植。”<sup>(6)</sup> 泉州自古以来山多地少，地狭人稠，但是由于甘蔗的经济效益高，在当地甚至出现甘蔗田挤掉水稻田的现象。据明代陈懋仁所撰《泉南杂志》载“甘蔗杆小而长，居民磨以煮糖，泛海售焉。其地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故稻米益乏，皆仰给于浙直海贩。”<sup>(7)</sup> 明代，随着蔗车的开始使用，泉州的制糖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关于蔗车的结构，清人张尚瑗《糖车》诗云“闽南多蔗林……制糖

(1) (晋) 葛洪《西京杂记》卷 4，载《四部丛刊·子部》，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

(2) 李玉昆、李秀梅《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史》，第 44 页。

(3) (宋) 苏颂撰，胡乃长、王致谱辑注《图经本草》，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年。

(4) (明) 嘉靖《惠安县志》卷 5，《物产》，宁波天一阁明嘉靖藏本刻本第 1 册，上海古籍书店，1963 年。

(5) (明) 何乔远《闽书》卷 150，《南产志》，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闽书》校点组点校第 5 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4456 页。

(6) 乾隆《泉州府志》卷 19，《物产·果之属》，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据象山书社民国十六年乾隆版补刻本影印，第 9 册，1984 年。

(7) (明) 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载王云五主编《泉南杂志·闽部疏》，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第 7 页。

常有格，锯齿磨轮形，驱牛负其轳。楂如谷磨剉，汁似漕床滴，坎地置瓷罍，涓涓受沥液。傍为釜甑具，炽火燔以负。既济功斯成，粲然熬波白，作甘配酸碱，饴饧随俗适。”记述了蔗车和与之相配套的整个工艺。蔗车的使用，甘蔗不必切断，可直接放入蔗车夹碾；其次，可将蔗汁一次性榨出；其三，可以连续作业，中间不需停顿，大大提高生产率。<sup>(1)</sup> 先进的制糖工艺促进了泉州制糖业的发展，当时泉州生产糖的种类有白糖、砂糖、冰糖、牛皮糖等，并且成为海上私人贸易的主要产品之一。

清代，蔗车普遍使用并有所改进，《天工开物》说蔗车的辊筒是用木制的，清康熙年间闽浙总督刘兆麟也说“闻南安县芒蔗，用木车磨煮糖，名曰蔗车。”<sup>(2)</sup> 乾隆时期黄叔瓚的《台海使槎录》则把蔗车称为“石车”，可见当时已改用石头制造辊筒。石头辊筒体重耐磨，榨蔗能力远胜于木制辊筒，使用石辊筒是一个进步。据乾隆《泉州府志》卷19“物产·货之属”记载“糖，有黑砂糖，有白砂糖。白糖有三种：上白曰清糖；次白曰官糖；又次白曰贩尾。其响糖、冰糖、牛皮糖皆煮白砂糖为之。晋江为多，南安、惠安、同安、安溪俱有。”<sup>(3)</sup> 此时，泉州的糖远销国内外，是北艚贸易中的大宗商品。



石辊筒（成冬冬摄）



石辊筒

除泉州本地生产的蔗糖，台湾也是清代最重要的产糖地区之一。清政府收复台湾后，随即解除海禁、实施开海贸易政策。在民众私航活动的推动下，台湾与沿海各省之间的通商口岸不断增多，闽台之间的贸易日益发达。泉台的郊商随即脱颖而出，在台湾与沿海各省经贸往来中担负特殊使命。他们将台湾糖、米等货物运载北上贸易，也将台湾所需的各种商品贩运来台。台湾产蔗糖历史悠久，受福建影响很深。清统一台湾后，由于土地的开发，甘蔗种植十分兴盛，制糖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产量也随之增加。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起义时，闽浙总督曾令云：“……令某统兵向南路打狗港，攻入台湾，

(1) 李玉昆、李秀梅《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史》，第144页。

(2) 转引李玉昆《南安人发明黄泥盖糖脱色法》，载《泉州晚报（海外版）》，2005年7月20日。

(3) 乾隆《泉州府志》卷19，《物产·货之属》。

……登岸旱田百余里，夹道蔗林，处处可容伏兵，非焚烧化平，未便轻进”<sup>(1)</sup> 这说明台南打狗港的旱田是一甘蔗种植地，规模很大，有一百多里地。台湾的制糖技术传自闽南，当时已经非常成熟。据连横所著《台湾通史》记载“制糖之时，须用糖师，以蔗浆入镬煮之，俟其火色，入以石灰，俟糖将成，又投蓖麻油，恰中其节，乃移於槽，以棍搅之，渐冷渐坚，是为青糖。最佳者曰出类，次曰上斗，又次曰中斗。又有白糖，其法以成糖时，入于漏内，下承以锅，而受其汁，谓之糖水，上盖以泥，约十四日，其色渐白，易泥盖之，凡三次悉白。惟下稍赤耳。白糖之佳者，曰头档，色皎味香。……次曰二档，又次曰三档，色稍逊而味甘。台南郡治所制白糖，谓之府玉，驰名各阜。糖水再熬之糖曰赤沙，性凉可解毒，又以酿酒。白糖再熬成块，剖而为片，其坚若冰，谓之冰糖，亦曰糖霜，价较贵。”<sup>(2)</sup> 那么台湾的产糖量和价格又如何呢？据《台海使槎录》所记“三县（台湾、凤山、诸罗）每岁所出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乌糖百斤价银八、九钱，白糖百斤价银一两三、四钱。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莫此为甚。糖斤未出，客人先行定价；糖一入手，即便装载。”<sup>(3)</sup>

清代前期泉州商人在沿海北艚方向贸易的商品中，蔗糖是其中的大宗。泉州商人将泉州本地生产的蔗糖以及通过闽台行郊贸易贩运来的台糖向北输送，并将当地的棉花、豆、棉布等运回泉州贩卖。因此，泉州商人活跃于沿海各地，并以沿海各地城市为据点，开展商业活动。浙江的乍浦、宁波，江苏的上海、苏州，山东的莱阳、胶州，天津，东北的锦州等地，均是其据点。以天津为例，闽船北行每年一次，顺风十余日即可到达天津。每年四、五月南风的时候北上，到九、十月间即可返回。清代北京所需的巨量物资，在海运兴起后，大多通过天津转输。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就有 2 只泉州府出发的船载运白糖、乌糖、粗碗、冰糖、鱼翅等，进入天津港。其中，有白糖 1 050 篓、乌糖 4 篓、糖果 28 桶、冰糖 50 桶。<sup>(4)</sup> 以《台海使槎录》所载，糖“每篓一百七、八十斤；乌糖百斤价银八、九钱，白糖百斤价银一两三、四钱”，若按每篓糖 170 斤计算，则该年共运乌糖 680 斤，白糖 17.85 万斤，则总运糖量达到了 17.9 万斤。假设乌糖每百斤 0.8 两，白糖每百斤 1.3 两，则此次运载的总糖价为 2 300 多两。雍正、乾隆时期，闽广商船前往天津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年约在 100 只左右。<sup>(5)</sup> 据清雍正七年（1729）七月二十七日直隶总督唐执玉闽船到津摺中所奏，从雍正七年六月十四日起至七月十七日间，共有 10 只闽船陆续抵达天津，船中所载的货物以松糖、鱼翅、橘饼、胡椒、鞭杆、粗碗等货物为主。在这 10 只闽船中，除其中 1 只是从漳州府龙溪县出发外，其余 9 只闽船均是从泉州府出发的。

(1) 林其泉著《台湾札记》，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第133页。

(2) 连横《台湾通史》卷27，《农业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48页。

(3) (清)黄叔瓚《台海使槎录》卷1，《赤笔谈》，载《台湾文献丛刊(影印本)》第21册，第21页。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7辑，“直隶总督赵弘燮奏报闽船到津并载货情形摺”，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初一日，第1048-1049页。

(5) 范金民《清代前期福建商人的沿海北艚贸易》，载《闽台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 雍正七年六月十四日至七月十七日到津闽船

商船编号	商人姓名	水手人数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壹千壹百拾贰号	张宁世	18
泉州府同安县顺字贰百陆拾贰号	赵志荣	17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捌百玖拾伍号	王崑瑜	23
泉州府同安县顺字壹百陆拾壹号	陈兴万	18
泉州府同安县顺字拾玖号	林桐甫	19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叁百伍拾捌号	洪全兴	17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壹柒拾伍号	林升璋	18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壹千玖拾壹号	李和美	18
漳州府龙溪县宁字贰百号	杨士元	18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壹千贰百拾壹号	庄岑	21

又据雍正七年八月初九日直隶总督唐执玉再奏的闽船到津摺，从七月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九日间，又有闽广船共 12 只陆续抵达天津关内，其中有闽船 10 只，广船 1 只，船中所载的货物也以松糖、洋碗、苏木、铁锅、毛边纸等货物为主。而 10 只的闽船中，泉州府出发的占 5 只，福州府闽县出发的 3 只，漳州府龙溪县出发的 2 只，福州府福清县出发的 1 只，由泉州府出发的闽船占其中的大多数。

## 雍正七年七月十八日至八月初九日到津闽广船

商船编号	商人姓名	水手人数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肆拾叁号	蔡必胜	14
漳州府龙溪县宁字贰百捌拾陆号	林正顺	18
泉州府同安县顺字壹百捌拾壹号	范苍盛	23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肆百柒拾捌号	施玺观	17
漳州府龙溪县宁字贰百玖拾伍号	柯荣盛	22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贰百肆号	蔡万源	15
福州府闽县平字肆拾捌号	曹广兴	22
福州府闽县平字壹百捌拾壹号	张长吉	22
福州府福清县昌字柒拾叁号	张德亿	19
福州府闽县平字叁百肆拾柒号	张彩鸣	21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壹千贰百伍拾肆号	德隆号	18
广东琼州府琼山县贸字壹号	王兴使	19

从雍正七年六月到八月间到津闽船的船数，我们可以得知泉州商船船数在同时期的到津闽船中占多数，但是关于商船中运载的商品及其种类、数量等，仍不具体，更难以反映其北艚贸易的总体规模和具体内容。但是从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十五日刑部尚书直隶总督刘於义的闽船到津摺中，我们可以得知，从六月二十四日起至九月二十日近三个月时间，共有 53 只闽船陆续抵达天津关内，其中自泉州府出发的有 22 只，其中晋江县 13 只，同安县 9 只；福州府 12 只，全部来自闽县；漳州府 10 只，全部来自龙溪县；兴化府 8 只，全部来自莆田县。<sup>〔1〕</sup> 在这份奏折中，还详细载明了这些商船所运载商品的品种和数量，为我们判明泉州北艚运贩商品的具体内容提供了可能。

### 雍正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起至九月二十日泉州商船运载货物表

商船编号	商人姓名	水手人数	运载货物
泉州府同安县 顺字十号	魏兴宝	21	松糖 584 包、白糖 77 包、陈皮 12 包、 苏木 410 斤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 四百七十八号	邱得宝	17	白糖 200 包、冰糖 10 桶、粗碗 100 000 个、粗茶钟 5 000 个、粗酒钟 18 800 个、调羹 2 800 个、粗小菜盏 7 000 个、 橘饼 50 斤、荔酒 3 坛、针鱼酱 110 斤、 糟鱼 160 斤、荔干 5 斤、浒苔菜 10 斤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 一千四十二号	王源利	18	白糖 370 包、冰糖 40 桶、橘皮 8 包、 松糖 16 包、鱼鳔 80 斤、茶叶 236 斤、 粗碗 120 050 个、粗茶钟 13 500 个、调 羹 14 000 个、粗酒钟 14 000 个
泉州府同安县顺字 三百一十二号	陈凤升	21	白糖 778 包、松糖 408 包、冰糖 29 桶、 橘饼 30 桶、海粉 6 箱、橘皮 30 袋、苏 木 2 500 斤、茶叶 226 斤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 一千六百八十八号	李德兴	23	白糖 739 包、松糖 676 包、橘饼 25 桶、 陈皮 16 袋、海粉 2 箱、冰糖 71 桶、闽 姜 18 桶、门冬 2 桶、麒麟菜 11 捆、枝 元 4 箱、苏木 2 355 斤、茶叶 1 132 斤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 三百五十八号	庄豸	17	白糖 210 包、冰糖 20 桶、白矾 9 篓、 散粗洋碗 45 000 个、酒钟 7 000 个、茶 盅 5 000 个、小菜碟 45 000 个

〔1〕 其中一只商船的归属地在奏折中载明为宁波府鄞县，而海关记录列为闽船，可能由于船主黄同春是福建人。

泉州府同安县顺字 一百八十一号	金隆顺	23	白糖 90 包、台松糖 656 包
泉州府同安县顺字 三百九十三号	洪振源	20	白糖 213 包、台松糖 511 包、冰糖 10 桶、胡椒 10 包、橘饼 6 桶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 一千六百六十八号	曾方泰	20	松糖 475 包、白糖 4 包、茶叶 30 篓、橘饼 9 桶、槟榔 7 包、海粉 3 箱、苏木 1 260 斤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 一千二百二十九号	郭凤兴	23	白糖 736 包、松糖 770 包、橘饼 76 桶、冰糖 35 桶、闽姜 4 桶、瓜饴 2 桶、门冬 3 桶、橘皮 11 袋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 二百四十二号	林胜兴	18	白糖 220 包、冰糖 19 桶、梔子 9 袋、香附 2 袋、粗碗 90 000 个、粗汤碗 5 篓、鱼翅 150 斤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 八百九十五号	苏元合	23	白糖 993 包、松糖 415 包、橘饼 84 桶、冰糖 32 桶、闽姜 2 桶、门冬 1 桶、橘皮 9 袋、苏木 990 斤
泉州府同安县同字 一百六十二号	黄万春	23	松糖 506 包、白糖 57 包、苏木 271 斤、烟 3 箱、枝元 1 箱、糖果 2 桶、细茶 5 篓
泉州府同安县顺字 一百二十五号	苏振万	17	白糖 613 包、松糖 238 包、三柰 42 包、良姜 40 包、槟榔 27 包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 一千三百十九号	陈元兴	18	茶 226 箱、白标布 82 匹、斜文布 70 匹、姜 17 篓、白矾 27 篓、粗碗 18 000 个、茶钟 1 800 个
泉州府同安县顺字 二百四十四号	王起兴	21	白糖 676 包、松糖 290 包、冰糖 64 桶、胡椒 35 包、乌梅 5 篓、橘饼 26 桶、闽姜 4 桶、茶叶 38 篓、苏木 5 410 斤、茶叶 117 篓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 九百七十九号	蔡兴盛	16	白糖 60 包、糖水 26 桶、粗碗 19 000 个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 八百七十四号	王得万	21	白糖 1 060 包、松糖 66 包、苏木 625 斤、藤丝 5 捆 3 包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 一千三百三十四号	李德利	20	白糖 467 包、松糖 380 包、白糖 57 篓、 绍兴酒 451 坛
泉州府同安县顺字 一百五十一号	徐良兴	18	兴茶 548 箱
泉州府同安县顺字 二百四号	徐永兴	21	白糖 1 227 包、松糖 275 包
泉州府晋江县发字 一千六百八十七号	陈振丰	19	白糖 1 339 包

资料来源：以上表格资料均来自《文献丛编》，“雍正朝关税史料”<sup>(1)</sup>。

这些泉州商船北艚所载商品中，最突出的是大宗商品蔗糖，且种类也不局限于白糖一种，还有松糖、冰糖、糖果、糖水等。其中，白糖共有 10 129 包，57 篓；松糖有 6 266 包。以山海关税则每包红、白糖 108 斤计算<sup>(2)</sup>，这三个月间，从泉州府运往天津的白糖有 1 103 622 斤，松糖有 676 728 斤，总价约为 11 624.2 两。其次是各种果品和日用器皿，并有一定数量的茶叶、苏木、海产品、酒类等。虽然品种较为单一，但是也充分体现出当时泉州地区北艚输出商品的特色。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蔗糖是泉州商人沿海北艚贸易中最主要的商品。在这三个月从泉州运往天津的 22 只艚船中，除了泉州府晋江县发字一千三百十九号和泉州府同安县顺字一百五十一号外，每艘船都会运载一定数量的蔗糖。而且有的船还是专门运载糖的糖船，如泉州府同安县顺字一百八十一号、泉州府同安县顺字二百四号和泉州府晋江县发字一千六百八十号。另根据雍正四年（1726）五月初四日福建巡抚毛文铨奏报关税盈余数目摺可知：雍正三年（1725）分所收海关税银正课共 66 549 两，扣除役工食银、铜斤水脚银、庶吉士银外，净得盈余 42 562 两。其中从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七日起至八月二十八日，闽海关所收的糖船验规银有 5 022 两；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二十三日所收的糖船验规银有 2 500 两；九月二十四日起至雍正四年正月二十六日止所收的糖船验规银有 3 700 余两。<sup>(3)</sup> 仅雍正三年一年间，闽海关共收了糖船验规银 11 222 两，占当时海关收入盈余的近四分之一。由此可知，糖船往来之频繁，贸易额之大，是其他商品所不能比拟的。这样，从康熙年间开海后，每年三四月间，从泉州满载蔗糖之船，通过海道北上温州、宁波、上海、天津、登莱、锦州等地，至秋天东北风起，又贩运棉花、棉布回程，这才有了“糖去棉花返”的民谚。

(1) 故宫博物馆编《民国文献资料丛编·〈文献丛编〉全编》第 5 册，“雍正朝关税史料”，北京图书出版社，2008 年，第 487-500 页。

(2) 参见邓亦兵《清代前期沿海运输业的兴盛》，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第 47 页。

(3) 故宫博物馆编《民国文献资料丛编·〈文献丛编〉全编》第 4 册，第 225-226 页。



#### 四、小 结

清康熙年间设立海关开海贸易后，沿海贸易迅速兴起，海道成为新的南北商品贸易大通道。在这种大环境下，福建商人成为清代前期沿海运输的主体。其中，泉州郊商以其地理及造船上的优势，在浙江的宁波、乍浦，江苏的上海、苏州，山东的莱阳、胶州，天津和东北的锦州等地开展北艘贸易，将本地出产的大宗商品蔗糖、各种果品、日用器皿、茶叶、木材等往北贩运，再将当地所产的棉花、棉布、豆货、干果等特产带回，促进了南北之间的商贸交流。

作者林仪：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文博馆员（泉州：362000）